



MARXIZM CHINESE MODERNIZATION
POPULARIZATION RESEARCH SERIES
FANTHOM - 000000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研究



YAN' AN SHI QI MAKESI ZHUYI DAZHONGHUA YANJIU

焦金波 著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党员干部等人的广泛认同，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进程大大加快，延安模式为构建新中国提供了基本框架。延安时期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中的第一个高峰，研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

 广西人民出版社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2013-QN-299）
南阳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研究

YAN'AN SHIQI MAKESI ZHUYI DAZHONGHUA YANJIU

焦金波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焦金波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219-08472-4

I. ①延… II. ①焦… III. 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中国—1935~1948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5241 号

监 制 白竹林

策划编辑

郑

责任编辑

郑

责任校对

郑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印 刷 广西南宁市桂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1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8472-4/D·1137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1)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和研究意义	(8)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11)
四、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	(12)
第二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提出	(13)
第一节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历史条件	(13)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需求是现实依据	(13)
二、前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教训是历史依据	(15)
三、抗日救亡是时代主题	(16)
四、高度整合的社会是组织基础	(18)
五、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在互动中改善是外部条件	(24)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31)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的提出	(31)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的基本内涵	(34)
三、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研究的几点认识	(42)
第三章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48)
第一节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概况	(48)
一、党的第一代领导群体的界定	(48)
二、党的第一代领导群体的形成	(50)
三、党的领导群体的特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资质的生成	(53)
第二节 党的领导群体与以干部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58)
一、学习运动与以干部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59)
二、整风运动与以干部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72)

第三节 党的领导群体与以农民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86)
一、党的领导群体对农民在革命中作用的认识	(87)
二、以农民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起始语境分析	(89)
三、以农民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	(95)
第四节 党的领导群体与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14)
一、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政治取向与革命作用的判定	(114)
二、党的领导群体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117)
三、引导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	(124)
 第四章 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29)
第一节 整风前后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身份角色转换	(129)
一、延安知识分子概况	(130)
二、整风前化大众的潜在主体与启蒙者的身份角色	(133)
三、整风中大众化对象的身份角色	(139)
四、整风前后知识分子身份变迁与角色转换的成因分析	(141)
五、身份角色转换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资质的生成	(149)
第二节 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运用	(150)
一、以出版机构为依托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	(151)
二、以各类学校为阵地宣讲马克思主义	(159)
三、以学术团体为平台研究马克思主义	(163)
四、以文化艺术为载体传播马克思主义	(169)
第三节 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与普及	(179)
一、“中国化”命题的溯源	(180)
二、“中国化”命题性质从学术到政治的演进脉络	(183)
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学理论证与宣传普及	(188)
第四节 延安知识分子与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	(195)
一、知识分子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	(195)
二、知识分子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198)
三、知识分子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	(206)

第五章 延安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213)
第一节 延安时期报刊媒介概述	(213)
一、陕甘宁边区报刊概况	(213)
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报刊概况	(214)
三、报刊媒介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缘起	(215)
第二节 延安报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	(220)
一、宣传延安整风	(220)
二、促进大生产运动	(221)
三、推进社会建设	(222)
四、普及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	(225)
五、推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最终确立	(226)
六、促进民主政权建设	(226)
第三节 延安报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	(229)
一、准确的媒体性质与办报方针定位	(229)
二、密切联系群众的传播内容、风格与组织体系	(233)
三、独特高效的产品生产与传播	(238)
四、规避同质竞争的新闻生态环境优化策略	(243)
第六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评价	(247)
第一节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成就	(247)
一、马克思主义被广泛认同和信仰	(247)
二、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250)
三、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	(251)
四、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基本框架的初步建构	(253)
第二节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缺陷与不足	(255)
一、常态化向运动式畸变的萌芽	(255)
二、从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双向结合到单向度的知识分子工农化	(256)
三、把翻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教条主义的倾向	(259)
四、缺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学理分析	(261)

第三节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启示	(262)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取向为前提条件	(262)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协调有序的组织体系为实施保障	(264)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与各社会思潮对话交锋为发展动力	(265)
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与民族文化良性互动为文化依托	(266)
参考文献	(270)
后记	(282)

第一章 绪 论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党的十七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短时间内,学术界取得丰硕成果,但也存在需要加强和深入的地方。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整体研究的现状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整体研究成为重点,取得众多成果,且向深度发展。

1. 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科学涵义的研究

学术界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不同研究者又从不同角度做了深入探讨。邱柏生认为,作为一种过程与机制,大众化就是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活化、通俗化、普及化、层次多样化以及循序递进性等等。作为一种结果,大众化则是指获得社会大众支持,成为人们言行的指导思想,成为社会大众日常话语的一部分。^①

黄俊和肖东波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个复合性概念,从传播范围来看,是指由党内普及走向社会普及;从表现形式来看,是指由高深理论走向通俗理论;从维系力量来看,是指由制度维系走向群众自觉。^②

刘建军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特指和泛指两种含义。它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泛指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大众化。^③显然,刘建军重点区分了命题的前半部分,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大众化”则未作解释。

左伟清和刘尚明则指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之分。关于前者,两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是指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大众的实践活动,又是指用大众的实践经验以及被升华的新理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后者,两人认为,普及与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超越政治、

① 邱柏生. 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和过程[J]. 思想理论教育, 2008(5): 8-13.

② 黄俊, 肖东波. 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9(1): 133-136.

③ 刘建军. 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若干问题[J]. 思想理论教育, 2008(7): 25-30.

经济、宗教、教育等因素造成的障碍,跨越年龄、性别、职业、阶层、地域等界限,成为人人参与的事业。^①由此可以看出,两人对当代中国缺乏界定,但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解比较新颖,且较为全面。

从以上学者论述可以看出,学者的标准、角度不同,对命题内涵的解读和阐释也不同,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科学划定标准。另外,还必须分清命题内涵的内在逻辑关系,明确内涵的不同层次。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将实现大众化的基本要求,如通俗化、民族化、时代化,简单地等同于大众化,似有不妥。

2.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

邱柏生指出,社会主流价值观通常需要经历教育宣传、社会心理影响、制度规约和公共政策影响等路径,才能被社会公众所广泛认同。其中教育宣传是直接性的,其他是间接性的,四种路径综合在一起共同起作用。^②

赵勇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专家学者要提供学理支撑;领导干部要作好“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示范,要形成“制度化的头脑”;立足日常生活,创新传播方式;创制亲近性文本,关注大众话语。^③

陈方刘和田辉强调,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文化结合起来,要注意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④

黄俊和肖东波提出,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通俗化的理论阐述、制度力量推动下的政治社会化、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的自觉学习和认知,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基石、轴线路线、有效辅助和本位力量。^⑤结论颇有新意,特别是将视角关注到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的自觉学习和认知,是众多研究成果中的亮点。

3. 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大意义的研究

黄俊和肖东波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唤醒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活力,捍卫其意识形态地位的必由之路;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业长青的现实需要;是

① 左伟清,刘尚明.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1):27-32.

② 邱柏生.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和过程[J].思想理论教育,2008(5):8-13.

③ 赵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实现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08(7):31-35.

④ 陈方刘,田辉.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J].云南社会科学,2008(2):5-7.

⑤ 黄俊,肖东波.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1):133-

维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思想理论根基和群众基础、巩固党执政地位的客观要求；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关键所在。^①

张博颖指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目的的需要，是提高大众科学思维水平、提升国民素质的需要，是文化多元时代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的需要，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需要。^②

曾令辉等人提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是全球化背景下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需要，是坚持和实现公民信仰与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和谐统一的要求，是使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客观要求。^③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研究极为薄弱

从发展历程看，一个科学命题提出之后，首要工作是要理清其内涵与价值意义。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科学命题而言，从其提出到现在，也只有短短4年时间，从其研究历程来讲，还处在初始阶段，所以研究者仍然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涵义、实现路径等进行整体研究。综观上述，也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然而，内涵的厘清和价值的确证，仅仅是一个科学命题研究的初始的最基础的工作。研究的进行必然要求在此基础上，探究其理论谱系和实践渊源，从中寻求有益借鉴，以求推动当代语境下该命题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亦是如此。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身还具有强烈的实践意蕴，当代语境下的实践带来的关注过去历史足迹的诉求就更为强烈。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很快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但是，目前关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还没有进入更多研究者的视域，还没有成为研究重点，是一个薄弱环节。只有个别学者涉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这一问题。根据笔者检索结果，主要是：

宏观研究上，杨军剑的研究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时期分为：早期传播时期、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初期、21世

① 黄俊，肖东波．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1）：133-136．

② 张博颖．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若干思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3）：9-13．

③ 曾令辉，等．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及其价值[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8（4）：24-27．

纪初期五个时期。^① 该研究着重划分历史进程的阶段,但却没有划分标准。另外论文全文 3600 字,篇幅过短,颇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在兰州大学杨宏庭的博士论文《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若干问题研究》(2009 年)里,作为论述的铺垫,该文第二章即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回顾》。历史回顾从论述五四运动开始,一直到当代,历史跨度长达 90 余年。尽管作者用了长达 29 页的篇幅回顾了这一历史进程,但总的来讲,该章像一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罗会德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②但缺乏相应历史资料作为支撑,实为一种缺憾。

其他学者则分别对各个具体历史阶段进行研究,主要有孙卫芳分析了建党初期中共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动因和实践,并进行了客观评价。^③ 侯松涛关注了十年内战期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她认为,十年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极为复杂的背景下展开,她从绩效、水准、实现三个方面总结了这一期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与启示。^④ 该研究以丰富的史学资料来支撑观点,显示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所做结论也很有新意。对于该文而言,“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环境对大众化的影响、“左”倾错误与大众化的内在关联等问题,都是这一时期突出的特点,因而也都是很好的研究切入点,研究可以再作深入。张品良从传播学的视域分别对中央苏区和长征两个特定时空间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进行探讨,^⑤两篇文章都是从传播媒介的角度来研究问题。单就传播媒介利用来看,研究具有相当深度,对今天利用传媒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很有借鉴意义。但作者明显对传媒作用的对象——受众重视不够,体现的仍然是传者本位的传统思维,不能不让人遗憾。此外,还有文茂琼的《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验研究》(《党史文苑》2010 年第 4 期),董海鹏的《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 年第 1 期),谭献民和唐政的《试论建国后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与特点》(《湖湘论坛》2010 年第 2 期),柳丽的《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历程分

① 杨军剑,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时期及意义[J],经济研究导刊,2010(28):221-222.

② 罗会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J],理论导刊,2009(3):13-14.

③ 孙卫芳,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J],求索,2009(9):227-229.

④ 侯松涛,十年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5):124-132.

⑤ 张品良,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学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2):4-10;张品良,长征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探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5):83-89.

析》(《理论界》2010年第7期)。上述文章,分别探讨了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整个历程(关于延安时期,以下详细论述),但每个历史阶段的研究都可谓势单力薄,有的历史阶段尚有两三个人研究,有的则彻底是孤军奋战。从研究重点来看,都是将历史经验作为重点,研究视野过于狭窄。而且,这些研究都未能结合当时的特定时间域,所以很难突出该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致使得出的结论针对性不强,泛泛而论。此外,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简单地理解和等同于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也是上述研究存在的共同误区。需要指出的是,张品良从传播学视域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无疑为研究提供了新角度,增添了研究分量。

(三)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系统研究尚属新领域

就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而言,其研究的薄弱现状与研究对象的高价值、历史地位极不相符,形成较大反差。延安时期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个高潮,但对其研究则极为缺乏。

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统计,主要有文茂琼、孙卫芳、李斌等人的文章。文茂琼的研究关注了各级学校教育、干部教育、普通民众教育等多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①但划分层次的标准出现交叉,将媒介与对象两个不同标准同时使用,概念集合上出现混乱。孙卫芳的文章认为,延安时期全党掀起了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潮,并形成了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互动性,当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具有一定的历史特点。^②李斌的文章,从对命题的界定入手,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分为逐次深入的四个层次,论述了当时通过群众教育、社会建设、榜样塑造和集体生活等方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③该文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理解有新意且较为准确。需要指出的是,三篇文章都是集中在基本经验与启示上。文茂琼与孙卫芳的研究,又都毫无例外地侧重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上,这表明,两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区分还缺乏科学认识。而且,与其他历史阶段研究一样,研究深度同样欠缺。主要是缺少相应的史料作为支撑,因而限于泛泛而论,实为一种缺憾。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间接涉及这一选题。前文提到的杨军剑的文章,由于着

① 文茂琼.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0(3): 114-117.

② 孙卫芳. 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9(6): 70-73.

③ 李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实践与当代启示——以延安时期为考察对象[J]. 西安社会科学, 2009(4).

重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进程作阶段性划分,且篇幅过短,涉及延安时期的就极为有限,文章仅用1100字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论述,颇有蜻蜓点水的感觉。杨宏庭的文章,整个历史进程表述长达3万多字,涉及延安时期却仅仅只有3000字,可谓寥寥数语,这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整个历史进程的地位作用也极不相符。

与上述整体研究不同,有些学者从特定角度研究。许冲对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进行研究。^①研究以《解放日报》为切入点,考察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选题独特,颇有新意,论证也很充分,结论妥当,令人信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程晓敏、李祥兴从大众化维度去研究延安整风运动,宿秀平则关注整风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②宿秀平、聂家华以及笔者则分别对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探讨。^③

由此看来,全面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受众、媒介、载体等进行系统地研究,基本上还是一个新领域,期待学术界高度关注。

(四)关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一定的关联,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状况作以考察。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上:

1. 对抗战时期(延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地位研究

郑德荣等认为,抗日战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经验和有利条件。它促进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了完整论述,解决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问题,为建立新中国并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勾画了宏伟蓝图。抗战时期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④吴向伟则指出,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形成时期,他

^① 许冲,对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历史考察——以《解放日报》为考察对象[J],现代哲学,2009(4):60-66;许冲,孟令蓉,《解放日报》与毛泽东经济思想大众化[J],广西社会科学,2011(1):93-96.

^② 程晓敏,李祥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域中的延安整风运动[J],宁夏党校学报,2010(1):16-18;宿秀平,延安整风运动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1):57-59.

^③ 宿秀平,聂家华,延安时期全党学习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J],传承,2011(2):4-5;焦金波,陈答才,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学习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2):26-31.

^④ 郑德荣,等,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7):63-66.

侧重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抗战时期得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①

2. 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研究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研究,主要是关于中共领导人、知识分子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还没有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角度去研究,毕竟大众化还要区别于中国化。但考虑到中国化的主体同时也是大众化的主体,所以对此问题有必要作详细考察。

关于中共领导人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张远新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1期)指出,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实现重大飞跃的时期。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不仅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而且深入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问题。这些探索,有力地领导和推动了当时党内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对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成熟及其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笔者在《论延安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因》(《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和《延安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群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南都学坛》2008年第3期)则分别探讨了党的第一代领导群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原因和特点。

关于中共领导人个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有:张远新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论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和《论延安时期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7期),笔者的《延安时期陈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黄德渊的《王稼祥在毛泽东思想成熟中的关键作用和杰出贡献》(《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戴小江的《论王稼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

关于知识分子整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主要有:中央党校张海燕的博士论文《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08年),张远新的《试论延

^① 吴向伟,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形成[J],中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3):324-328.

安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论延安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贡献》(《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王海军的《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8期)。

学术界还对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进行研究,集中在群体形成的原因、基本特征、历史作用与地位等方面,主要有:张远新的《论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作用》(《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3期),张正光和张远新的《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概况、成因及其基本特征》(《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耿化敏的《试论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4期),刘悦清的《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

对知识分子个人的研究,主要是对艾思奇和张如心的研究,主要有:曹爱琴的《艾思奇与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年第5期),田福宁的《抗战时期艾思奇与叶青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论争、影响及启示》(《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刘加洪和曾繁滨的《张如心在毛泽东思想概念形成中的作用和地位》(《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李泽华的《论延安时期张如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党史文苑》2007年第8期)。

上述对主体的研究,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都是集中于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与探索。对于探索的时代背景、主体素质(理论修养、知识结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等)基本上没有涉及,这势必影响到对主体作用发挥的深入研究。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和研究意义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本文以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进一步界定研究对象,使之更加具体化。

1. 关于时间阶段的界定

关于延安时期的界定,一般等同于陕北时期。陕北时期是指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具体地讲,指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将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迎接革命胜利曙光的13年。其间,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对延安实施重点进攻,在敌我力量极度悬殊的情况下,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

安,开始转战陕北。就其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定位而言,经历了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转变、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转变、解放战争等历史阶段。抗日战争历时8年之久,占据了整个延安时期的大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全党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延安整风运动又主要集中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因而本文在行文时主要以抗日战争时期为考察对象,同时兼顾其他历史段落。

2. 关于地理区域的界定

需要指出的是,延安时期仅是对研究对象在时间域的界定,而不是空间域的限制。从理论上讲,其他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在延安(陕甘宁边区)以外区域的实践,是这一事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一事业发展和壮大的表现和象征。除了地理空间不同外,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它们都与延安(陕甘宁边区)有着同质性。它们甚至都是以延安(陕甘宁边区)为蓝本,体现和折射出陕甘宁边区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到陕甘宁边区的缩影,因而它们也是研究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切入点。基于上述考量,笔者研究的区域对象不局限于陕甘宁边区,也包括其他抗日根据地。只有这样,才能全面考察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全貌。

3.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界定

本文所指的马克思主义,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包括毛泽东思想。抗战时期党的方针政策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故而在笔者研究之列。

从更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甚至就是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受到自身文化理论水平、认知特点和能力的极大限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信仰更多地是以中国共产党及其实施的政策为媒介,体现在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实施的政策认同和追随上。党的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本身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基于上述考量,笔者把对党及其领导的事业的宣传、认同和信仰,也看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认同和信仰,而并非只是单纯地认知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

此外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界定,在第一章将有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二)研究意义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学术意义、实践意义。

1. 政治意义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走过了90多

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之路。90 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人民从初识马克思主义,到信仰、运用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初纷至沓来的众多外来思潮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民族解放、民族富强、民族复兴的唯一理论武器,成为 60 多年来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也使得中国共产党由建党初期只有几十人的革命党,成为当今拥有 8000 多万党员和广大群众基础的执政党。90 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成就巨大,影响深远。

因此,回顾包括延安时期在内的 90 多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总结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回顾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何以为人民群众所接受、认同、信仰,马克思主义如何赢得人民群众,可以增强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感,有利于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凝聚力;可以诠释党执政的历史缘由和合法性,使人民群众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形成的,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社会政治基础。

2. 学术意义

目前,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无疑是研究最集中的地方,历史进程研究则比较薄弱。虽然,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人从事研究,但每个历史阶段的研究者可谓单枪匹马、孤军奋战、势单力薄。更重要的是,研究价值也不高,正如前文所说,都未能结合特定阶段的历史背景、时代主题。这就使得研究结果泛泛而论,没有针对性。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受众、载体等没有涉及,对主体涉及较少,大部分局限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媒介。此外,研究中还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简单地理解和等同于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误区。

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顺利进行并取得重大突破,其最终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被全党广泛认同、接受,并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而这恰恰正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目的、意义和标志所在。因此,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历史进程中的第一次飞跃,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具有重要历史启示。显然,要推动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进程的研究,研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而且,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薄弱现状与极高的价值和地位也极不相符,形成较大反差。因此,研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